

● [美] 毕乃德 著 ● 曾钜生 译

洋务学堂

● 杭州大学出版社

洋 务 学 堂

〔美〕毕乃德 著

曾钜生 译

杭 州 大 学 出 版 社

(浙)新登字第12号

洋 务 学 堂

[美]毕乃德 著

曾钰生 译

*

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天目山路34号)

*

浙江余杭五常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 7.25印张 165千字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1—500

序 言

本书全面评述了中国政府在第一次中日战争（1894—1895年）前所采取的开设新式学校的措施，并详细地探讨了最初三所重要官办学校。除了叙述所涉及的十多所学校的性质和取得的成就以外，我想着重考察并尽力说明19世纪后半叶抵制教育改革的原因，希望通过这种分析能够增加我们对中国现代化的了解以及填补我们在这方面的空白。

本书使用威妥玛—翟理思的汉字罗马拼音，只有个别例外，如普遍使用的Peking（北京）。“呈送给皇帝”的奏折的日期或“北京收到”的日期，都是指皇帝正式披阅奏折的日期，如《筹办夷务始末》或《东华续录》所记载的日期。在官员的著作集里提到的奏折的日期是指发往北京的日期。本书多处提到“银两”，根据马士的记载，1864年一两值80个英国便士，1874年值76个，1884年值67个，1894年值38个。未注明出处的汉译英的译文都是我翻译的。

在写作过程中，蒙吴新敏（布罗姆夫人）协助汉译英，我的妻子卡米拉协助编辑，门克夫人和沃纳夫人帮助打字，谨致谢意。

由于得到洛氏基金会和在华美国教育基金会的资助，我才可能于1949年在南京从事研究；同时，金陵大学中文研究所所长和图书馆馆长李少元（译音）教授也给了我热情的帮助，为我提供了大量的有关文献目录；国立中央大学毕业生

王守义(译音)是我在南京的助手，对于他们我表示诚挚的谢意。康乃尔大学教员研究拨款委员会为我提供补助，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及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图书馆让我使用大量的研究材料，在此我一一表示感谢。

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的欧文博士允许我使用他收藏的未发表的傅兰雅著作的手稿，我感激不尽。

绮色加，纽约

奈特·毕乃德

1961年2月28日

目 录

第一章 学校的背景与历史(1861—1894)

中国维新的播种期·····	(1)
传统教育和改革教育的主要建议·····	(7)
学校情况·····	(24)
障碍与成就·····	(55)

第二章 同文馆

建立·····	(74)
改组·····	(84)
1870年后的工作·····	(98)
结局·····	(107)
问题与成就·····	(109)

第三章 江南制造局的教育和训练

上海同文馆·····	(122)
教育活动的扩充·····	(131)
1870年后教育部门的工作·····	(139)
成就·····	(153)

第四章 福州船政学堂

建立·····	(158)
---------	---------

在日意格指导下.....	(165)
1874年后的情况.....	(172)
缺点和实有的成绩.....	(193)
译后记.....	(201)
书目提要.....	(203)
外国人名中外文对照.....	(221)

第 一 章

学校的背景与历史(1861—1894)

中国维新的播种期

19世纪开头的几十年间，中国实质上没有受到西方势力的触动。与欧洲的合法贸易仅限于远离腹地的广州和恰克图这两个地方，在17世纪已蓬勃发展的基督教传教活动从1724年起受到禁止。英国马戛尔尼大使（1792—1793）曾劝说中国政府与各国建交并扩大中英贸易，但他完全失败了；1816年抱着同样目的的阿美士德勋爵使团也遭到失败。然而到了19世纪30年代末期，英国已准备使用武力来改善英国商人在中国的地位，中国赖以对付欧洲人的森严壁垒，终于被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缺口。

1840到1895年，即英国在鸦片战争中首次使用武力和中国在第一次中日战争中遭到覆灭性失败期间，正是维新的种子在中国散播的时期。在这半个世纪里，颇有进取心的西方传教士、商人和官吏，向中国介绍了西方文明所形成的思想和方法，并加以广泛传播。与此同时，中国承受着与日俱增的压力，要求使之适应于现代世界。而控制着中国并以世代相传的中国固有文明而沾沾自喜的士大夫阶级，却顽固地反抗任何的变革。1860年以后，中央政府或个别省分的官员引

进了一些革新措施，但都是练兵制器之术，就是倡议者也认为这些只不过是表面上顺应一下西方的压力而已。直到1895年中国羞辱地败北于一向受人藐视但已经过维新的日本以后，维新的种子方才开始萌芽，中国人才认真考虑到进行根本改革的必要性。

中国第一次败于一个西方强国之后，与英国、美国、法国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1842—1844年间），其结果是割让香港这个具有战略性地位的岛屿给英国人，开放五个港口给外国人居住和贸易，并在其它方面为西方的渗透铺平了道路。19世纪50年代中国限制外国人活动的种种做法，导致了英法两国在1856年至1860年间采取一连串的联合军事行动，结果又签订了天津条约（1858年与英、法、美、俄签订）和北京条约（1860年与英、法签订）。这样，中国的门户向外国势力敞开了。自那以后，在北京建立了外国公使馆，受外国控制的商埠也增加了，并允许基督教传教士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外国的教义。

在上海的各国租界成为外国势力在中国的主要基地。上海不仅是西方贸易与金融的中心，而且是许多基督教布道团体的总部，有很多教会出版物在那里出版。外国势力的另一些中心是北京的西方公使馆和完全由外国人操纵的海关总署，英国殖民地香港，以及天津、广州、汉口的外国租界。

居住在中国和香港的大多数西方人认为中国是极端落后的，赞成中国按照西化的方式改变。为了寻找有利的贸易机会，商人们极力主张开矿、筑路和架设电报线路。他们将西方的经商方法传授给中国雇员和代理人，并在中国的沿海和内河经营轮船航线。外国人所占据的殖民地和租界是按照西

方的方式而不是中国的方式管理的，往往比中国的城市管得更有条理，秩序井然，传教士比商人更加热心于中国的变革。当然，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国人民皈依基督教。但是，其中很多人，特别是新教徒，认为他们的使命不仅仅是单纯地宣传基督教。此外，他们要传播的佳音就是西方文明——它的社会和政治理想与物质文明，以及基督教徒信仰的教义。他们开设学校和医院，翻译宗教与非宗教著作，出版大量的期刊和书籍。最后还有许多外国使馆和领事馆的官员以及中国政府中的外国雇员，他们都在为中国的改革而工作。他们的动机因各人的目的而异；有些人希望加强中国政府的稳定和秩序，另一些人则对支持国外传教士和商人的活动感到兴趣；而有一些人则试图“改良”他们所崇敬的中国。

19世纪40年代初，有少数中国人建议中国政府采纳西方文明的某些成果。到1860年以后，要求的人数更多。清廷派往广州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1839至1840年间的行动加速了鸦片战争的爆发，他也承认西方的军事优势并极力主张中国采用现代武器和军舰。在他于1840年9月被撤职以前，就收集过西方的情报并亲自试用新式的枪炮与战舰。^①其后，在1842—1843年间，清廷发布了一系列敕令，命令沿海各省政府要注重海防现代化，其中用了这样的措词：“务必改革”，“不要墨守成规”，但是没有什么行动，清廷又很快回复到极端保守主义。^②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出版了著名历史学

①吉迪恩·陈：《林则徐：中国海防采用西法的先驱》（1934年）第6—10页；邓嗣禹与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954年）第28—29页。参阅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略》（1943—1944年），第511—514页《林则徐传》。

②吉迪恩·陈：《林则徐：中国海防采用西法的先驱》（1934年），第54—60页；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953年）第184—185页。

家和地理学家魏源编辑的《海国图志》，书中收集了林则徐所提供的一些材料。该书还有一份中国的防御计划，其中提到在广州附近建造海军造船厂和兵工厂。在这些工厂里，西方技术工人将在法国人和美国人的指导下，教中国工人如何造船和制造武器，西方的驾驶员将讲授航海技术和炮击技术。^①《海国图志》虽然多次重版，但是它似乎没有立即促使中国采取行动，到了60年代，中国人比40年代末和50年代更易于接受新事物的时候，该书无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清朝政府在50年代受到太平天国、捻军和其它反叛者的一系列打击，又于1856至1860年间接连遭受到外国的武装侵犯直至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终于促使了汉族和满族中的有识之士认真注意改革。这一派包括了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他们着手进行的改革，后来被称为“同治中兴”（1861——1870年）。他们的纲领是通过重建已经衰败的传统的纲纪，使日益无能的政府恢复活力。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某些改革主张，他们期望这些改革既能适应新情况又不违背正统的儒家思想。^②1860年后的二十年间所采取的改革包括这样一些内容：一套新的外交关系、几个新式兵工厂和船厂、一些新式陆军和海军舰队、一个商船队和四所我们即将详细讨论的新式官办学校，即北京、上海、广东的同文馆和福州船政学堂。

在19世纪60年代的改革中，最得力的人物就是同治中兴

^①1849年重印本，第1卷第40页（魏源序于1842年）；吉迪恩·陈：《林则徐：中国海防采用西法的先驱》（1934年）第5—6页；邓嗣禹与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35页。参阅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略》第850—852页《魏源传》。

^②芮玛丽：《中国保守主义最后的立场》（1957年），第7—8页。

的五位首领：在首都的恭亲王奕訢和文祥以及在外省的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奕訢和文祥是北京最有权势的官员，他们控制着军机处和新建立的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两个部门。奕訢（1833——1898）是咸丰皇帝的弟弟，在他的侄子同治皇帝尚未成年时，他是三个摄政王之一。文祥（1818—1876），满洲旗人，进士出身，西方人认为他是京城里的杰出的政治家，受到中国人的高度尊重。^①

曾国藩（1811—1872），湖南人，1860至1868年任两江总督——从1860年起至1864年占领太平天国首都为止，他总管镇压太平天国的军务——1868至1870年任直隶总督^②。在这个时期里，他无疑是最有权势和最受器重的官员。左宗棠（1812—1885），也是湖南人，是一个抵抗太平天国卓有战功的军事领导人，1863—1866年任闽浙总督，1866—1880年任陕甘总督。左宗棠是一个异常忠诚和坦率的官员，虽然他全神贯注于镇压西北和新疆的叛乱，影响了他60年代以后在沿海各省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他在北京是有很大的影响的^③。李鸿章（1823—1901），安徽人，他是曾国藩的门生，于1862至1865年间江苏巡抚任内由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而从此闻名。在同治中兴运动中，他已经是一个主要的人物了，在他长期担任直隶总督（1870—1895）期间，他的权势日益扩大，成为洋务派的首领。^④

70年代，在文祥去世和奕訢在政治上失势之后，尽管中央政府拒绝领导进展缓慢的变革，各省官员仍继续要求改革

①参阅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80—384页，第853—855页。

②参阅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51—756页。

③参阅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2—767页。

④参阅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64—471页。

——起码是在物质方面的改革。从70年代后期到1894年这段时间出现了这样一些新事物：建设了全国范围的电报系统，陆海军和各种设施的进一步现代化，第一条铁路的建筑，开始了现代化的采矿和一些工业上的发展。

1885年后，李鸿章的主要竞争者，作为进步的政治家，是直隶人张之洞（1837—1909）。张之洞于1884年至1889年两广总督任内开办了若干新企业，但是作为改革者，他经营的主要基地是武昌。从1889年到1907年除了在南京和北京有过短期职务以外，主要担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兴趣虽然很广，但他最关心的是学校的兴办，铁路的发展和钢铁的生产。^①在中日战争前的二十年间积极从事洋务活动的其他外省官员，还有沈葆楨（1820—1879）、丁日昌（1823—1882）、刘坤一（1830—1902）和刘铭传（1836—1896）。^②在此期间，派驻外国的三位外交官也强烈要求祖国变革，他们是：郭嵩焘（1818—1891），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曾纪泽（1839—1890），曾国藩的长子，1879至1888年任驻英公使，薛福成（1838—1894），1890至1894年任驻英公使。^③

如前所述，在1895年以前，大部分中国人致力于改革的主要动机是使中国强大起来以抵抗西方的压迫。他们都明白他们自视甚高的中国伦理是补偿不了武器上的劣势的。由于士大夫阶级普遍反对任何种类的改革，所以在这个时期提倡改革的人们不得不以军事防御为借口，表明他们的建议是正当的和必要的。奕訢是否认为中国参加到西方外交关系的体

①参阅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7—32页。

②参阅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42—644页；第721—723页；第523—524页；第526—528页。

③参阅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8—439页；第746—747页；第331—332页

系中去只不过是使中国得以预先了解西方的侵略意图，从而能够对付它；而李鸿章主张架设电报线路和建筑铁路，究竟是为了使中国得到经济上的利益，还是仅仅为了改善中国的防御能力，这都是无法肯定的。但是，他们两人都清楚地认识到必须以军事上的需要来证明这些措施是合理的，才能取得大部分中国官员的赞同。孙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警句经常被引用来证明诸如建立驻外使馆、学习外国语和派遣留学生等措施是正确的。要掌握西方制造武器的科学基础，常常被列为鼓励中国人学习现代数学和科学的理由。

传统教育和改革教育的主要建议

长期以来，教育一直是中国的重要事业，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便是由受过教育的杰出人物管理的。科举制度在它到1905年被废除为止的一千三百年间，一直都是读书人进入官场的主要敲门砖。要参加考试，必须作这几方面的准备：熟读经书，了解经书的释义；掌握写文章的技巧。实际的知识对于有学问的官员来说是没有用的，反而被贬之为职员和工匠才应该有的东西。在19世纪的中国社会里，政府衙门有极大的威望和权力，当官也是发财致富的途径；因此打入官场便成了一切想出人头地各阶层家庭中有出息的子弟孜孜以求的目标，所有中国人只要力所能及，都为参加科举考试而努力读书。即使那些只通过初试还没有资格做官的人，也都进入了特权阶级。这个阶级的成员被当作上等人而受到政府的优待和同伴们的尊重。

科举考试是有一定的等级的。先后由知县、知府主持的考试称为初试，通过初试的考生再参加由省学政主持的每三年两次的院考。参加这一系列考试的人中，有百分之一到二被授予生员或秀才的称号，这是最低一级的科名。另外一种最低等级的科名叫做监生，可以用钱买或由皇帝授予；虽然它比考试得来的威望要低一些，但是有同样的特权，也可以参加省试。省试（乡试）是三年一次在各省省会和北京地区的顺天府举行的考试，秀才和监生可以参加乡试，大约有百分之一、二的人被授予举人，这是第二级科名。举人有资格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三年一度的考试（会试），会试的结果，通常有200—325人被授予最高一级的科名——进士。对于军人和旗人，也有相应的各种等级的考试，军人考中的在科名前加上“武科”字样，旗人考中的在科名前加上“翻译科”字样。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是从进士、举人、贡生中挑选的。贡生是没有考上高一级的考试但因学识过人，而被推荐到中央政府去的生员。^①

整个清朝的科举考试包括着三个部分：一、写几篇题目选自“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文章和一首古诗；二、写几篇题目选自“五经”（易、书、诗、礼、春秋）的文章；三、策论。第三部分策论有一个时期涉及到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的问题，但到了18世纪末，已转变为没有争论的语言学方面的问题了。在19世纪期间，考试

^①张仲礼：《中国绅士》（1955年）第5、11—14、21—26页；艾蒂安：《中国科举考试》（1894）第35—64、92—94、103—104、213—218页。有时西方作家在谈及这三个科名时，把它们当作“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张仲礼反对用“degree”（学位）这个词，是有一定道理，但是由于已经广泛使用我也仍然用这个词。

十分重视文章格式和书法，而忽视学问和见解。其结果就是知识分子对古书本身很少去研究，而对于能让考官中意的枯燥乏味的文章格式和以往考试中考中者的文章却花很大功夫去学习。^①

中国的学校绝大多数是私立的，通常都是由秀才或落第秀才任教。有时有更高科名的人或在职官员也被请来授课或辅导富家子弟和准备参加高级考试的考生。私立学校通常是依靠学生的学费、个别的家庭或家族、或是乡村中的捐款来维持的。当然，学校的课程根据科举考试的内容决定，一切教育都是为科举做准备的。在前几个朝代，官办学校的教育是有很大的重要性的，到了清朝，比较起来，官办学校的实际教学就少了一些。在同治中兴强调了复兴官办学校之后，实际上，所有县城或较大的城市都设有官办学校，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学校并不正式上课。它们的主要任务是对那些愿意参加的人进行一月或半月一次的考试，文章写得最好的可以得到奖金。但是对于参加这种考试的人来说，最大的吸引力在于这将是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前的一次写作练习。有些官办学校如19世纪90年代苏州的学校，有足够的资金来供养一个教员和十五至二十个住宿生。就是这样的学校，它的主要工作仍然是为在各地学习的数百名以至上千名学生进行定期的考试。^② 尽管中国的教育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它除了培养出许多平庸的官吏之外，却也造就了一些卓越的官员，这些人都有很强的传统伦理观念，对于使中国社会及其政府延续

①张仲礼：《中国绅士》第174—179页。

②郭秉文：《中国公共教育制度》（1915年）第61页；潘俱文：《苏州的官办书院》，《教务杂志》第24期（1893年），第534—540、579—584页。

两千多年的一切惯例是十分娴熟的。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长期以来所实行的中国传统教育是最好的教育，事实上，直到19世纪末，这种教育也还是唯一可行的一种教育制度。但是，在19世纪中叶，少数有独立见解的思想家开始要求学习西学和西方的技术基础知识。如前所述，早在1844年，魏源就提出中国向西方学习一些东西的好处。虽然魏源肯定会拒绝对于传统的古典教育作任何改变，但是他还是提议用西方的专家来教中国的工匠和士兵制造武器，建造并驾驶新式舰艇。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两广总督祁埭据说也曾建议改变科举考试的范围，引进一些新的科目，包括数学和制造工艺；有一个御史在1851年也作了同样的建议，但是这两个建议都没有结果。^①

19世纪60年代初，苏州一位为李鸿章当过几年幕僚、备受人们尊重的学者和教育家冯桂芬，曾经强烈呼吁政府鼓励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各种学科。大约在1861年年底以前写了《采西学议》、《制洋器议》和《上海设立同文馆议》三篇文章。冯桂芬哀叹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无知，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②他认识到中国同西方列强继续接触是不可避免的，他把二十年来中国在军事上、外交上所遭受到的奇耻大辱的失败，归咎于军事技术上的落后和依赖于那些无能的中国“通事”来翻译西方著作和介绍西方情况。

冯桂芬对后一弱点感到忧心忡忡。他写道，有许多外国

①《东华续录》（1909年）光绪朝第82卷第10页。

②《校邠庐抗议》（1861年序，1892年版），第67—74、99—101页。冯桂芬在他写的《上海设立同文馆议》一文中提到京师同文馆的事。很清楚，这篇文章是在决定开设京师同文馆之后写的。但是它必定是在1861年底以前写的。因为他的文集的序言是在1861年写的。